

景教与大秦寺

JING JIAO YU DA QIN SI

关英 著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僧靈寶

景教与大秦寺

关英著



僧靈寶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景教与大秦寺/关英著.—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5.12

ISBN 7-80628-979-8

I. 景... II. 关... III. ①景教-研究-中国②景教-教堂-研究-中国 IV. ①B976②B97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6408 号

景教与大秦寺

关 英 著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电 话 (029)87205106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人民日报社西安印务中心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5
插 页 4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500
标准书号 ISBN 7-80628-979-8/K·436
定 价 22.80 元(平)



关英，1950年生，陕西周至人。1977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先在师范院校任教十余载，后从事文物保护工作数十年。特别是任大秦寺文物管理所所长以来，完成多项重大文物保护工程和景教历史研究课题，撰写研究文章20余万字，在国内著名刊物发表文章多篇。2001年10月，应邀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的“基督教人学研究学术研讨会”，重要论文收入社科院《基督宗教研究》学术论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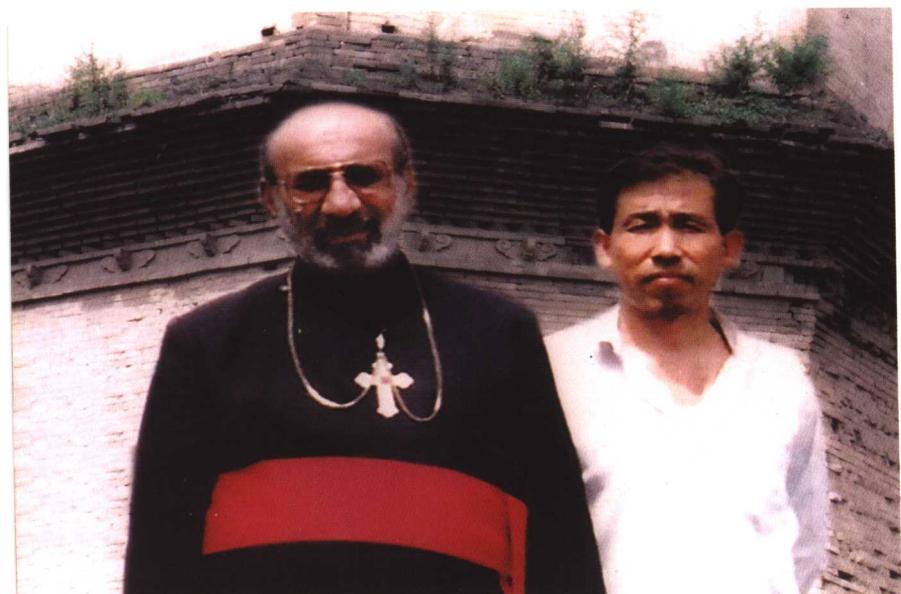


雄伟壮丽的大秦宝塔





作者与香港著名企业家陈立文先生在大秦寺景教碑前合影留念



伊拉克东方教会斯理瓦主教考察大秦寺图为作者与斯理瓦主教合影留念（牛光显摄影）



2001年10月，作者应邀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研讨会期间，与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先生合影留念



北京大学副校长郝平率北大学者考察队来大秦寺考察访问，图为作者与郝平博士（左）徐苹芳老教授（中）合影



英国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联盟秘书长，国际著名学者马丁·帕尔默先生多次来大秦寺进行学术考察图为帕尔默（左三）先生在大秦寺塔内室考察古代泥塑



帕尔默先生（右三）七上大秦进行学术考察，并出版了研究大秦寺的专著《耶稣箴言录》一书图为帕尔默先生赠书的情景



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段晴博士考察访问大秦寺



瑞典著名学者、汉学家杨富雷先生考察访问大秦寺



韩国景教历史研究院院长李敬云先生（右二）在陕西省基督教协会会长王怀仁牧师的陪同下，来大秦寺进行考察访问



美国学者在兴致勃勃地参观大秦寺出土文物



日本景教历史探源学术考察团一行来大秦寺进行考察访问



日本著名学者考察团团长川口一彦先生在参观景教文化展馆时，为作者赠送纪念品



外宾们在惊奇地观赏大秦寺出土文物



英国旅游团一行数十人专程来大秦寺观光考察，图为客人们在瞻仰大秦宝塔的风采

序

偶然闯入景教研究的领域，实在是因为敦煌北区发现的一篇景教的轶文。随后经过从书本到书本的搜寻过程，从电脑到纸张的写作过程，一个课题便已经结束。容不得对旧课题的眷恋，容不得对旧课题的遐想，带着旧的遗憾，新的兴奋，又匆忙地进入一个新的领域。这大约便是现代学者的所谓充实，其实也是无奈。一部厚厚的书稿，寄来的时候还蒙着一层淡淡的、却是实在的黄土高原的尘埃，让人重又忆起那些似乎已经淡去的故事。

一

三秦大地上，盛开的黄黄的油菜花虽不是一眼望不到边，但一两畦绿的叶鲜黄的花衬托在黄土高原的土地上，也为在旅途的人平添旷怡之情。与好友惠京鹏、詹秦、杨磊相约，我们驱车前往大秦寺。车停在离大秦寺不远的山坡上，一所乡村小学校旁。刚好赶上孩子们下学，三五成群的山村子弟，正准备翻山越岭，回家，为了第二天再翻山越岭，赶来上学。平缓的山坡上，不见牛羊散满田，却见还未成熟的麦子在依然强烈的斜阳之下勇敢地展示着它那盎然的绿。沿着缓缓的山路，望着古塔前行，便来到现在的陕西西安周至大秦寺文物管理所。

所谓陕西西安周至大秦寺文物管理所，不过是巍峨雄伟的古塔旁三间低矮的平房，塔下不大的一块空地。绕过塔去，是残砖破瓦构成的厚厚文化堆积层。朋友们笑着说，只要随便踏上一脚，掉下来的不是唐的瓦，也是明的砖。这一座兴许是始于唐的文化堆积层实际上构成了一家农户的后墙，更准确的说是他家猪圈的后墙。这一家农户，宽敞的三间土房，前后门大敞着，农妇坐在门前的小板凳上织着一件细线毛衣，也许是习惯了偶然来访的人群，女主人只是友善地看看来人，接着又去忙她手中的活儿。山、塔、农家、麦地，构成了关英所长工作生活的氛围。

三间低矮的平房之内，飘着淡淡的茶香，茶香是塔旁一泓泉眼涌出的甜水所沏成。攀谈间，得知关所长竟然是著名的西安美术学院的毕业生，在此守望这传奇的宝塔已经达十年之久。当然，他也曾应邀去北京参加最高规格的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论文。想到他需要克服种种不方便，从这穷乡僻壤前往繁华的国际都市，而从繁华再回到简陋，竟然坦然地安守在这寂静的乡土之间，面对眼前这位一袭旧蓝布装的关所长，大家不禁肃然起敬。

二

翻开沉甸甸的一部书稿，读到夹在书稿中的一封信，信中写道：“由于大秦寺地处高山，偏僻荒凉，交通不方便，打印文章要步行，上山下山往返十多里路程，一部书下来要跑无数次，白天打印，晚上挑灯修改（山上无电），总之，本人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完成这本书稿。”读到此处，一面感到阵阵的心酸，一面不由得生出疑惑。因为，类似景教研这样的题目，若不是以大城市最壮丽的图书馆为依托，是不可碰的；因为，历史上汉文献中保存的相关景教的记载真是少得可怜，而国外的著述颇丰。山上塔旁，晚上连

序

电都没有，更何谈电脑，更何谈国际互联网，如何能够把握国际的最新成果呢？

带着满心的疑惑，翻开书稿，映入眼帘的是那些曾经熟悉的名词，诸如聂斯脱利、景教、十字架，以及苏轼等诗人留下的美丽的诗篇。然而，书中大部分内容却又是陌生的。作者亹亹而叙，犹如一个久别重逢的家乡人，绘声绘色地描述着故土的变化，故人的新事。跟随着作者的道白，才知道那座神圣的山，原来唤作丘木山，山上终年吐着清凉泉水的井，竟然是唐太宗所开凿。生动的叙述，教人不忍释手，一口气读下去，心中的疑惑便也如冰释。

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述，作为文物管理所的负责人，他曾接待过上百位中外著名学者和宗教界人士，曾和他们在古塔前交流、切磋。借出门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也曾用微薄的薪水购买专门研究景教的名著。通过书本，关所长得以建立起知识性的构架，而日日夜夜与古迹相守，以他艺术的慧眼便能够发现新的问题，于寂静之中提出大胆的论证。

对古寺的庙会文化、民间传说的记述，构成这部书最为鲜明的特点，这是经院之内的学者们无法做到的。只有常年镇守在这古塔旁的人，才有可能亲历常年寂静的古塔少有的热闹场面，才能写得出如《古刹庙会纪盛》那样的文字，将民间文化活灵活现地再现在纸上。《拯救大秦寺塔记》不但记载下现代人为拯救文物而做的贡献，而纪实的文字也成为这部书的一篇佳作。《陈立文捐资刻名碑》篇令人感动，不但值得敬佩的香港捐资者的音容笑貌及其胸怀跃然纸上，字里行间更见西北人待人的热忱以及关英所长对这古塔倾注的全部的爱。

关所长以他守望古塔十年的历程以及以心血写下的文字证明了，他确实是“大秦寺文化的开拓者”。

三

景教是基督教最早延伸到中国的一脉。据说耶稣当年曾要求他的弟子们，把基督教的福音传遍全世界。实际上，基督教在亚洲传布的历史，要早于在西方。今天伊拉克、土耳其以及伊朗的部分地区，曾经是信仰基督教的地区。传说在耶稣生活的时代，伊得萨地区，即现在土耳其的乌尔法（Urfa）地区，有个国王患上麻风病，听说耶稣会治病，曾派遣使者前往耶路撒冷，邀请耶稣来伊得萨地区为他治病，并将基督的福音传播到他的王国。^①这当然是传说，不足以凭，但是，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座坐落在幼发拉底河西岸的古城最迟于公元二世纪期间已经接受基督教，到了公元三世纪初期，大部分居民都已经皈依了基督教^②。三世纪时，伊得萨的神学院已经成为基督教的学术中心。随着历史的发展，在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的政治较量的背景之下，活跃在这一地区的基督教会也曾经分化出种种派别，另竖旗帜。

五世纪时，以君士坦丁堡为核心的基督教会发生内部纷争，大主教聂斯脱利于公元 431 年遭到排斥，但是他仍然不缺少支持者。公元 489 年，支持聂斯脱利观点的基督学者们被从伊得萨的神学院逐出，随后进入萨珊波斯帝国的版图，并得到波斯帝国当权者的庇护。这一派人自称为聂斯脱利派，于是成立了独立的教会，分 6 个教区，教区覆盖的地域基本包括了古巴比伦尼亚和亚述人的疆域^③。萨珊波斯帝国的大好江山，为聂斯脱利派基督教会提供了得以独立发展的疆域，发展出独特风格，比如教会使用叙利亚语，书写的字体也与其他叙利亚教会不同，因此又素有东叙利亚教会之称。

正是这一派基督教会于唐代把基督教的福音传播到中

国，并在大唐的疆域成立了一个教区，而教区的主教由总部直接派出。从第一任主教阿罗本，到大秦景教碑建立（公元781年）的时候，共有四任主教先后来到大唐。主教来到教区，好比与这个教区结婚，终身不得离开。试想当年，一个又一个的外域人，为了自己的信念而远离故土，奋不顾身地翻山越岭，穿越流沙，最终将自己的身躯永远地埋在千万里之外的外邦。若不是这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谁又能记得起这些基督的忠魂呢？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虽文字不多，但这不多的文字犹如解系历史谜团的线索，可以从中抽绎出丰富的历史信息。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最为切实可靠的史料出发，所有学者几乎得出一致的结论，景教更多地是在生活在唐的波斯人、西域胡人中得以传播、维系。碑中记载一名僧人，名“文贞”，这位文贞姓李，又名李素，是个曾在唐朝为官的波斯人。景教碑的大施主伊斯是位西域胡人。《新唐书》、《旧唐书》虽是官修正史，很少涉及与唐家政权无大妨碍的民间往来，但是书中星星点点的记载仍能反映出，唐代与波斯和西域胡人的交往，颇为频繁，生活在唐的波斯人、西域胡人为数众多。例如两部《唐书》于《田神功传》下记载，安史之乱时，仅在扬州城死于非难的胡商波斯人就达数千。肃宗时，也曾发生大食、波斯袭击广州的事件。而西域胡人聚集的地方为数甚多，例如凉州等地西域胡族盛，渔阳城中也曾有胡商立邸肆^④。民风民俗也受到胡人的影响，坊邑中也见骏马胡服，法胡虏之俗的情形。除了安禄山这样十分著名的胡人之外，王世充、李元谅等也都是名见正史的胡人、波斯人。史学家考证出，粟特人的行踪曾绵延数千里，上起安国，下逮营州。萨珊波斯解体之后，随卑路斯王入朝的波斯人可能不只他一家人。李白的《幽州胡马客歌》、《上云乐》也确实反映了胡人的